

构建中华文化和谐社会指标意义探究

—基于中国“一带一路”城市的启示

冯瑞龙¹, 高胜文², 黄匡忠¹, 陈家豪², 罗琨瑜³

(1.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 广东 519087; 2. 国际(澳门)学术研究院, 澳门 999078; 3. 澳门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学会, 澳门 999078)

【摘要】当今世界呈现出全球化、讯息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大趋势, 工业 4.0 与大数据时代比预计提早出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价值双环流下, 对于沿线 20 多个国家和众多城市治理的现代化, 对于建立区域互惠共赢, 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研究团队尝试回应“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给世界带来什么?”的研究问题, 提出中国应该在丝路国家联盟当中担当更重要的文化角色即: “双重的文艺复兴”: 既复兴以儒家为主, 重视家庭和社会和谐的中华文化, 追求大同社会的亚洲道德价值, 也复兴西方过去重视个人价值与全人发展的人文精神。对此, 本文以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等 4 项, 以及国外的社会指标 10 多项作参考, 从而探究构建中华文化和谐社会指标对“一带一路”城市的启示与意义。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 城市治理; 社会指标; 中华文化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城市治理的现代意义

丝绸之路始于中国西汉, 盛于唐代, 是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陆上商业贸易路线。后来成为东方与西方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陆上丝绸之路, 起自中国古代都城长安, 经河西走廊、中亚国家而达地中海, 以罗马为终点, 全长 6, 440 公里。这条路被认为是连结亚欧大陆的古陆上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至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从中国东南沿海, 经过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 穿过印度洋, 进入红海, 抵达东非和欧洲, 在宋元时期, 中国同世界 60 多个国家有着直接的“海上丝路”商贸往来。

当今世界格局呈现出经济全球化、社会讯息化、和文化多样化、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大趋势, 工业 4.0 与大数据时代较预期提早出现。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价值双环流下, 对于沿线 20 多个国家和众多城市治理的现代化, 对于建立区域互惠共赢, 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①

澳门学者高胜文认为, “一带一路”倡议自 2013 年提出以来, 得到了国际社会, 特别

收稿日期: 2022-2-17

作者简介: 冯瑞龙,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通识教育学院副教授; 高胜文, 国际(澳门)学术研究院院长; 黄匡忠,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院教授; 陈家豪, 国际(澳门)学术研究院青年委员会主任; 罗琨瑜, 澳门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学会会长。

^① 张辉. 全球价值双环流架构下的一带一路愿景[M]//刘伟, 郭濂. 一带一路: 全球价值双环流下的区域互惠共赢.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P3.

是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回应。基于历史与现实，“一带一路”保护、传承、融合、创新、发展与提升了古丝绸之路的内涵，任重而道远，从国内到国际来看，它具有平衡国内经济发展，保持经济持续均衡增长、促进国际经济贸易平衡、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推动各种交流，共创美好未来的意义。^②

毫无疑问，“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城市治理的发展，“城市”是非农业人口大量聚集，具有综合功能的人类生产和生活共同体，它具有人口密集，资源密集，文化荟萃，信息集中，工作高效等特点。城市在有限的地域空间内，各种生产要素高度密集且相互交集在一起，从而形成复杂的社会网络系统。“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由农民变为市民，人口规模不断扩张，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城市用地不断向郊区扩展的过程。

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对于沿线 20 多个国家和众多城市的现代化和建立区域互惠共赢具有重要的意义。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研究，是全世界近年来社会科学的关注焦点，今天的国际多边、双边机构和学术团体以及民间志愿组织关于发展问题的出版物很难有以“治理”为常用词汇的。如世界银行 1992 年度的报告就以《治理与发展》为标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1996 年以《转变中的治理》为题总结经合国家的治理变革、《国际社会科学》杂志（英文版）1998 年专门刊发了一期探讨治理的文章。在学术研究中，也已出现一些代表人的代表作，如罗西瑙(James N. Rosenau)的《没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和变革》、罗茨(R. Ross)的《新治理：没有政府的统治》、彼得斯(Guy Peters)的《治理的未来：四种出现的模式》等等。

在公共管理领域，治理一词也逐渐获得话语霸权，在很多地方取代了公共行政和政府管理。学者郭先登等认为，“中国现正实现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的伟大跨越”。^③

在详细考察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治理模式后，瑞士政治学者皮埃理（John Pierre）认为西方有四种主要的城市治理模式，即：管理模式、社团模式、支持增长模式和福利模式。

1.管理模式

管理模式模式强调专业参与而非政府官员的渗入，“让管者管理”是其口号。

主要参与者是组织生产和公共服务的管理者，以及消费者。目标是：增强公共服务的生产和分配效率，真正让消费者选择产品和生产者。

2.社团模式

社团模式有两个层面的参与，直接参与是各利益团体的高层领导，间接参与的则是各利益团体的基层人员。目标在于分配环节，即确保以利益团体的利益塑造城市的服务和政策。关键手段是包容：使所有主要的行为人及其利益进入城市的决策过程。

3.支持增长模式

支持增长模式的主要参与者是当选的地方官员和商界精英，他们在推动地方经济的问题上利益共享。目标是实现长期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该模式的手段包括：城市规划，运用来自中央/区域政府的资源，发展基础设施，解立良好的城市形象以吸引投资。

4.福利模式

^② 高胜文. “一带一路”：历史积淀与现实价值[J]. “一国两制”研究. 澳门：澳门理工学院，2018(36)：P118-127.

^③ 郭先登. 实现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伟大跨越[N]. 青岛日报，2014年3月16日.

福利模式的主要参与者是地方政府官员，目标是确保国家基金的流动以维持地方的活动。该模式的实现主要依赖地方与较高层政府的网络关系。该模式不大可能长期维持，如果中央或地方财政出现赤字，则更会雪上加霜。

目前，中国主要城市的发展，正从管理模式与福利模式转向社团模式与支持增长模式为主。^④中国城市的现代化，正好为一带一路城市提供参考和比较。

二、城市治理的社会指标评体系

（一）国外社会指标研究的发展与应用

城市治理的现代化是颇为抽象的，引进国外社会科研工具的“社会发展指标”，则可以使抽象的事物变得可具体描述。“社会发展指标”可以定义为“量定某一社会发展程度的指数的材料”。社会发展指标体系依其功能可以区分为描述性指标体系、评价性指标体系和规划性指标体系。

在上述背景下，一种以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目的的“社会指标运动”于从20世纪60年代首先兴起于美国，并逐渐在世界各国盛行，社会指标被用来对社会发展趋势和各种社会问题进行评价、监测，社会指标已成为现代化管理的重要手段。^⑤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OECD)把“社会指标体系”定义为“监察某一根本的社会问题因时改变的情况及其水平的直接和有效的统计计量制度”（社会问题的定义为“对人类幸福产生根本和直接重要性的，可鉴定和可界定的灵感或问题。”

较早关于综合指标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33年，美国出版的“社会趋势报告”是该领域早期的经典之作。诺尔(R.C. Noll)将20世纪50年代联合国撰写的社会指标体系方面的著作视为该领域重要的经典著作。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是社会指标研究的起源地，美国的健康、教育和福利部推动了社会指标运动的发展。美国的社会指标运动快速发展之际，欧洲国家及联合国的一些组织也认识到社会指标的意义并积极行动。此外，许多非官方的国际组织也开始了社会指标的应用及研究。^⑥

目前在国际组织、国家和地区三个层面，社会综合指标的研究和应用都出了大量的成果，综合指标已经在政策制定、生活质量评估和国际比较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国家层面，英国于1996年发布了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全球首家公布全套可持续发展指标的国家；此外，前苏联、罗马尼亚、日本、法国、澳洲等也都建立和公布了自己的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定量标准方面，西里尔·布莱克(Cyril E. Black)在1966年提出现代化的10项标准；英格尔斯标准(Ingles)则提出了现代化的11个评价指标。

目前，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国家治理评价体系可分为4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多边机构、双边机构及独立机构。^⑦

1.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④ 王佃利. 城市治理體系及其分析維度[J]. 中國行政管理. 北京：中國行政管理學會，2008(12)：P73-77.

⑤ 陈长华. 我国现代化进程的统计研究[D]. 湖南：湖南大学硕士论文，2004；卢丹. 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研究[D].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硕士论文，2002.

⑥ 汤美莲. 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国际标准[J]. 桂海论丛. 广西：广西区委党校，广西行政学院，2003(3)：P85-87.

⑦ 俞可平. 关于国家治理评估的若干思考[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3期. 湖北：华中科技大学，2014：P1-2.

(1)以贫困和性别为维度的民主治理指标框架;(2)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7/2008); (3)联合国人类发展中心的“人文治理指标”(Humane Governance Indicators, HGI); (4)联合国奥斯陆治理研究中心的“民主治理测评体系”(Measuring democratic governance)。

2. 多边机构

(1)世界银行: 世界治理指标(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WGI); (2)世界银行: 国家政策与制度评估(Country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Assessment); (3)世界银行: 治理与反腐败观察(Governance and Anti-corruption Country Survey); (4)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 人权与民主治理测评指标体系(Measuri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tic Governance)。

3. 双边机构

(1)英国海外发展组织(ODI): 世界治理评估(Worldwide Governance Assessment); (2)美国国际发展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民主与治理框架(Democratic and Governance Assessment Framework); (3)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 治理与腐败战略评估(Strategic Governance and Corruption Assessment, SGACA)。

4. 独立机构

(1)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治理倡议; (2)欧美各大学进行的治理质量观察, 例如: 歌德堡大学等。

(二) 联合国的社会指标: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在2000年联合国总部纽约举行的千年峰会上, 世界189个国家的147位元首和首脑一致通过一份《千年发展目标》(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简称MDGs)。《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旨在实现世界和谐, 从极端贫穷人口比例减半到普及小学教育, 从遏止艾滋病的蔓延到进一步发展开放的、遵循规则的、可预测的、非歧视性的贸易和金融体制, 从扭转环境资源的破坏到向致力于减贫的国家提供更为慷慨的官方发展援助, 从家庭、妇女、儿童问题到和平、平等、发展问题。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共包括8项总目标、18项分目标和48项具体指标, 8项总目标包括: 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普及初等教育、促进性别平等, 赋权于妇女、减少儿童死亡率、改善孕产妇健康、遏制HIV/AIDS、疟疾和其他疾病、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为发展而建立全球伙伴关系。

综观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我们可以发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具有如下明显的特点: 牢牢锁定发展的目标在于“富民”、“国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保障穷人的基本生存”; 始终体现不让“平均数掩盖贫困数”; 尤其注意不为千差万别的国家划定一个统一的标准, 只是给出了一系列的指标, 但不提出具体的指标标准值; 强调考核政府在国内外的一系列相关职责和政策, 如考核政府在国内履行“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普及初等教育”、“促进性别平等”、“遏制疾病”、“保护环境”等应尽职责方面的绩效。

但要注意的是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 是考虑全球众多国家特别是未发展地区, 所以对中国及“一带一路”发展中城市, 并没有提高的引领意义。

(三) 中国的城市发展社会指标

中国社会指标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以来, 依据国家的发展战

略和发展重点，上海、北京等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统计局、国家计委、国家科委等部门相继开始探索，先后提出多种指标体系，如现代化水平、社会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指标体系；包括国家发改委的小康社会指标体系，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中科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的现代化水平指标评价体系，以及一些城市的城市综合竞争力指标体系 and 创新能力指标体系等。多数指标体系一般采用客观指标，从不同的评价目标出发，演绎评价的结构。

2005年以来，国内一些省、市相继制定了和谐社会指标体系，中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社区与世界银行有关专家也提出了相对简约的多角度评价指标。有关的研究主要从和谐社会的基本理念出发，演绎出相关子系统，进而选择有代表性的重要指标。

学者陈柳钦认为现代化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更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尺，应该是一个不断发展、前进的目标。对于中国这样的历经艰辛的后起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已经成为一种激励，是民族国家凝聚力的体现。即使有一天我们都达到当时发达国家的指标，也不能说现代化至此大功告成。我们要把目标放在下一阶段，重新制定现代化指标，与时俱进，这样，现代化指标才能不断保持生命力，才能真正对社会发展起到指导作用。^⑧

总的来说，国外研究主要从发达国家的经验和需求出发，确定具有自身特点的指标体系，国内研究则较多地侧重于理论方面。从支持社会建设目标设置、评价社会建设成效、引导社会政策调整和并完善相关制度安排来看，国内研究还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现有的指标体系中多以直接反映发展水平的指标为主，政策评价及制度安排因素一般未纳入考虑。二是以一般以定量指标为主，不设置主观评价指标，公众评价未能纳入评价体系。

三、植根于中国文化“城市和谐社会指标”体系

（一）和谐社会的提出

本研究认为，在参考前人优秀研究经验的基础上，在设置客观指标外，应引入主观评价指标。中国国内社会建设的评估与国际上关于社会发展状况和水平的评价，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指标是大致接近的。国外相关评价体系提供了社会评价的一般方法和基本构架。特别是根据对象要求选择评价重点的方法，目标设置及评价与监测相结合的指标选择，以及重视制度安排和相关指标的运用，对社会建设指标体系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社会建设理应吸收国内外社会指标研究的精华，并且进行大规模的具有代表性的调查研究，从而让社会指标为政府对社会发展趋势和各种社会问题进行评价、监测、制定社会政策、评估市民生活质量以及城市发展相互比较中发挥作用。

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的十六次大会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时，第一次发布了实现和谐社会的要求。《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

（二）和谐城市指标的探索

2002年提出和谐社会是我国“社会建设”是重要里程碑，自此和谐城市社会指标的研

^⑧ 陈柳钦. 国内外现代化指标体系和标准概述[J]. 全球科技经济瞭望.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资讯研究所、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1(1): P63-72.

究大量涌现。例如 2005 年 深圳发布了关爱指数、幸福指数、人文指数、安全指数、诚信指数、环境指数和廉洁指数等 7 个一级指标 75 个二级指标；2007 年杭州提出包括自然环境与居住条件、生活出行与公共安全、社会福利与医疗健康、教育与文化娱乐、社会参与和社会公平的 5 大类 45 个指标以评价城市生活质量的体系。2007 年华东理工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的教授联合组成的“中国和谐发展课题组”发布了城市和谐发展指数，包括了“经济增长指数”、“人文发展指数”、“社会进步指数”、“生态文明指数”四个维度。

201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第一次发布了对和谐城市竞争力的排名和更新了和谐社会的指标。刘金伟解析该报告是认为：“城市是以人为中心、以自然环境和公共设施为依托、以经济活动为根底的、复杂的社会系统。整个城市包括经济、自然环境、公共设施、社会四个大的子系统，只有这四个子系统互相配合、协调开展，城市才能到达和谐。”他认为建设和谐城市要根据两个原则，即公平正义原则和包容性原则。公平原则重点是教育和就业的平等机会，社会阶层的开放流动，社会公平还要具备非歧视性和非垄断性。和谐城市的包容性提现在多元文化的共存、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不同民族、地域、派别的文化交融。和谐城市的政府管理应更加公开透明，以建立有效的处理矛盾、冲突的制度，通过制度实现利益均衡。和谐城市应该是能够提供一个安全的、法治的、保障基本权利的社会环境。^⑨但到了 2013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报告却使用了宜居、宜商、和谐、生态、知识、城乡一体化、信息和文化等 8 个方面 68 个客观指标，来反映城市可持续竞争力即未来竞争力指数。可见，社科院的和谐城市指标研究没有得到直接的延续。

（三）和谐城市的定义与社会心理健康

闵学勤和张鸿雁认为和谐城市首先应表现为城市人的和谐，富足的生活不等于和谐，只有人们心灵的祥和，人际关系的融洽，可预期的收入稳定，健康的生活环境，才能让城市人享受和谐之道。但和谐的经验都是他人投射在自我身上的体验，因城市和谐是指人们集体共存的和谐，是主观性的也是制度性的。^⑩这与西方社会人文精神所强调的平等，博爱观念是一致的，与共融、公义、多元、包容等价值观是非常吻合的。

闵学勤和张鸿雁 2008 年运用的和谐城市指标共 7 个一级指标，57 个二级指标。7 个一级指标包括：可持续发展、社会保障、社会稳定、市民幸福感、城市文明建设、城市更新接纳度、社区和谐。

诚言，和谐与社会心理健康是分不开的，和谐城市是环境，居民幸福感是结果。在制定和谐城市指标时，可以参考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有关的概念。

按照 Artiga & Hinton 的模型（见图 1），健康社会决定因素分为五个方面：经济（收入）稳定，社会社区互联，邻里物理环境，教育和食物健康。本研究的五个引领性指标具体如下：就业与收入稳定，保障职业前景，控制失业率；物理生活空间：人口密度；人口当中接受教育程度的分布；食品供应与安全；社会和谐：避免家庭解体，家庭暴力。

^⑨ 刘金伟. 社会建设视角下中国和谐城市评价研究[J]. 中国名城. 扬州: 中国城科会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 2013(10): P44-51.

^⑩ 闵学勤, 张鸿雁. 和谐城市及其指标体系建构[J]. 广东社会科学. 广东: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2008(1): P171-1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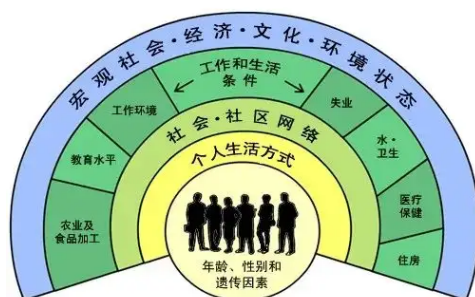


图 1 健康社会决定因素图

综合国际上的理论和中国 2002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的十六次大会提出了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以来中国城市与学者的探索，建议重塑和谐社会指标如表 1：

表 1 和谐社会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一) 社会机会平等	1) 普及 9-12 年免费教育, 2) 就业平等公平公正, 3) 没有性别和年龄歧视
(二) 社会安全	4) 犯罪率低, 5) 社会性暴力冲突少,
(三) 社会包容	6) 没有种族、信仰群体性冲突; 7) 没有社会性种族、信仰、男女、收入歧视
(四) 收入保障	8) 基尼系数, 9) 社会(医疗及养老)保障 10) 家庭可预期稳定收入
(五) 家庭和谐	11) 离婚率低, 12) 家暴事件少, 13) 法定幼儿照顾, 14) 法定父母照顾
(六) 公共服务均等化	15) 免费基础教育, 16) 公立医疗服务比例, 17) 低廉公共交通服务, 18) 公共房屋比例

上述和谐社会指标的提出，可以说既提现了西方人文精神和福利社会的发展，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全人健康的目标，也继承了东方重视家庭的观念。引礼记礼云首段礼运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脩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上述和谐城市指标体系乃大同社会的传承。

四、中华文化对一带一路城市建设的贡献

(一) “一带一路”城市建设与文化保育

中国在丝路国家联盟当中担当更重要的文化角色，建设“双文艺复兴”：既复兴以儒家为主，重视家庭和社会和谐的中华文化，追求大同社会的亚洲道德价值，也复兴西方过去重视个人价值和全人发展，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有了这种大时代的文化魄力与恢宏气度，崛起后的中国文化产业才可以以艺术的美感感动世界，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也可望逐步走上领导世界潮流的地位。既复兴西方价值，更复兴亚洲价值，有了这种大时代的、文化魄力与恢宏气度，中国的文化事业才可以引领世界潮流。

现时文化方面的问题所在，是文化商品市场上提供的东西，其实在深度和多元化方面都不足，说不上是自由选择，往往只是向下的自由，而不是向上的自由，即提升人的生命尊严和生活情趣的自由。甚至不如 2000 年前儒家孔子所提倡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兼顾文科、理科；学科、术科；体能、精神。修心之余，能达到全人发展。

现代中华文化，在全世界范围来说的最大价值，可算是重视个人的“修身”与社群的

“大同”。两者如阴阳互补，互相牵引但不可或缺。两者于中国之和谐社会建设，于国际之公民社会外交，都值得深入探讨。

(二) “一带一路” 和谐城市的指标

“一带一路” 沿线城市的差异更大，因此提出 20 多个国家的众多城市必须设立：1.国民账户系统，提供国民收入所得等粗经济数据；现代化发展已开始一段时间的城市进一步设立；2.客观社会指标；现代化发展已达一定基础的城市再增加设立；3.主观社会指标，以综合反映城市治理的现代化进程，并与同一地域的临近城市比较，作为改善的参考。

上述“国民账户系统”的优点是即使是发展中国家和城市，例如亚洲内陆的部份国家，也会有本项数据，但缺点是国民账户系统假定平均分配，因此掩盖了社会不公平现象；“客观社会指标”可按照上文提议的六个一级指标和 18 个二级指标。考虑到大区域的比较，指标的数量已经减到最少。使用客观指标为了减低争议，但一些城市可能没有公开的数据。指标的有效性和跨文化共通性也需要进一步研究验证；“主观社会指标” 则包括各个利益相关者的主观反映，既包括认知反映，也包括情感反映，所以现时在学界的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人类学研究以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普遍使用，可以作为补充。

(三) 运用更全面的社会指标引领社会经济发展

此外，应设定比较模型来完善城市治理的主要内容（见图 2）。城市治理现代化理论包括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和环境现代化等等。1.经济现代化的主要特征：工业化、专业化、规模化、非生物能源广泛利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超过农业等。着力点集中于产业，市场和财政，保证经济活动和市场有序地运行；2.社会现代化的主要特征：社会阶层分化、组织专门化、社会流动、城市化、家庭小型化等。着力点在调控人口流动和社会保障，通过社区基层组织的重构和创新来巩固社会秩序和预防社会问题的产生和激化；3.文化艺术现代化的主要特征：宗教世俗化、观念理性化、普及正规教育、知识科学化、信息传播等。着力点在成为一个城市的名片，与其他城市有所区别，整合资源，使文化艺术(含体育旅游)成为软实力；4.环境现代化：相关的研究例如：“城市宜居指数研究”《零点宜居指数——中国公众城市宜居指数 2006 年报告》，“城市幸福度研究”《2005 年中国城市及生活幸福度调查报告》：十大城市幸福度的总排名；5.危机管理：自美国纽约市 911 恐袭，日本福岛 311 地震、海啸、核泄漏事件以后，不言而喻，危机管理成为有效的城市治理的试金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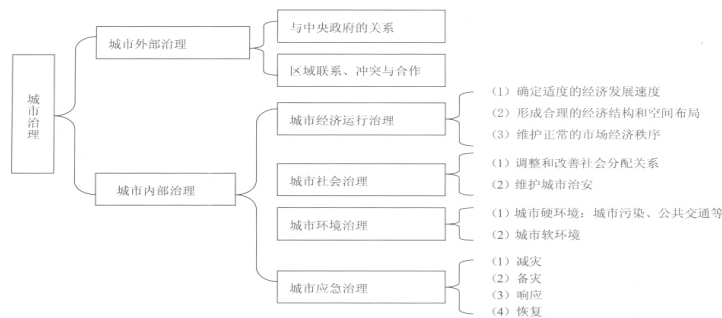


图 2 城市治理的主要内容

资料来源：徐静. 城市治理研究的最新进展及一般分析框架[J]. 珠江经济. 广州：广州市社会科学院，2008(9)：

五、和谐社会的概念有待推广

本文探索了联合国千年发展指标，和中国在经济发展加速，城市化加快，社会治理难度加大的情况下，国家提出了和谐社会建设的策略，和过去十多年和谐城市指标体系的探索。可惜的是和谐城市的理念，没有与中华深厚的传统文化连接，被西方国际组织的宜居城市概念或可持续概念替代。宜居是技术性的；可持续是重视环保，但带功利性和片面性的。和谐城市是目标，是社会性的，是重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所以重塑和谐社会指标以引领一带一路的城市发展，可以是中华文化对世界的贡献。

Exploring the insights and significance for establishing indicator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harmonious society - based on the studies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cities

Shui Lung FUNG¹, Seng Man KOU², Hong Chung WONG¹, Jia Hao CHEN², Kuan U LO³

(1.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United International College, Guangdong 519087;

2. International (Macau) Institute of Academic Research, Macao 999078; 3. Society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Research of Macau, Macao 999078)

Abstract: The world today presents a major trend of globalization, informat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The era of Industry 4.0 and big data emerged earlier than expecte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f China is of great strategic significance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in more than 20 countries and many cities along the line, an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regional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situation under the dual circulation of global value. The research team tried to respond "Does China bring social benefits to the world through the "Belt and Road"?" The research question of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China should play a more important cultural role in the Silk Road National Alliance, namely, the "dual Renaissance": it not only revives the Chinese culture with Confucianism as the main focus, and attaches importance to family and social harmony, and pursues the Asian moral values of the Datong society, but also revives the western humanistic spirit that used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personal valu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person. In this regard, this paper takes 4 items such as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more than 10 foreign social indicators as references, to explore the enlightenment and significance of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with Chinese culture indicators for the "Belt and Road" cities.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ity governance; Social indicators; Chinese culture